

“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

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shangjinlin@hotmail.com

—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路翎(1923—1994年)被誉为“天才”作家。1937年，还是初中二年级年仅十五岁的路翎就开始向报刊投稿(《一片血痕与旧迹》)¹⁾；1940年，年仅十八岁的路翎开始写长篇代表作《财主底儿子们》(1944年4月写完)；1942年，年仅二十岁的路翎写成著名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蜗牛在荆棘上》。写流浪者和知识者，张扬他们“原始的强力”，构成了路翎小说的一大特色。路翎才华纵横，可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他的命运也最坎坷。他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推崇“主观精神”，追求所谓的“生命力的扩张”，“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中国共产党——引者注)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²⁾，因而受尽了折磨。1955年6月19日，年仅三十三岁的路翎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逮捕，直到1980年11月才平反。而这一年路翎已经五十八岁，多年的牢狱生涯使他的精神早已崩溃，付出了灭绝灵性的惨重代价。

路翎明明不被革命阵营接纳，但他一直以“正确”和“革命”自居，自以为是革命大潮中的弄潮儿。1949年南京解放后，年仅二十七岁的路翎经胡风推荐，担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他穿上了军装，进入了共和国队伍的行列，满腔热诚地创作了活报剧《反动派一团糟》，以及反映解放初期工人生活的剧本《人民万岁》(后改为《迎着明

1) 刊《弹花》1938年2卷2期，署名烽。

2) 《文艺报》(第十八号)为舒芙《致路翎的公开信》加的《编者按》，1952年9月25日出版。

天))。7月,路翎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这次文代会上,郭沫若作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从总体上对三十年来的新文学发展史做了总结,提出了创作新中国文艺的构想,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和人民大众结合”,“做出为人民所欢迎并能教育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³⁾秋天,路翎便深入南京被服厂和浦口机车修理厂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相继创作了《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号”列车》等一批反映解放初期工人生活题材的作品。他笔下的劳动人民,不再是郭素娥那种“肉体上”和“精神上”双重“饥饿”的悲剧人物,而是新时代的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了。路翎在同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在铁链中》的《后记》中说:“我底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地失去了它的作为武器的性能罢。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疮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追随得那么痛苦。”⁴⁾

新中国的建立唤起了几代人的激情,在路翎“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追随“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的誓言出自由衷的挚诚。1950年年初,经胡风推荐,路翎调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为院长)工作,任创作组副组长。随后,他到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厂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创作了表现解放后工人生活的四幕剧《英雄母亲》,以及反映抗美援朝的剧本《军布》。11月,路翎又随同剧团到沈阳访问准备出国的志愿军,并于年底创作了剧本《祖国在前进》。他在1951年8月写的《〈祖国在前进〉后记》中说:“这个剧本,是在去年十一二月间,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时候写的。为了响应这伟大的运动,为了尽一份参加这伟大运动的责任,急切地写了出来”。“这个剧本主要地企图表现的是,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怎样地在工人阶级、人民政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底领导和帮助下,摆脱旧负担,走向爱国主义的道路。”进而而不无欣喜地说:“在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下,我们底新的文艺将有伟大的前途,能够在这阵营里做一名兵士,能够学习着来表现祖国人民底丰富的斗争形象和英雄形象,我是觉得无限幸福的。”

不过,在新中国建国初期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里,路翎生活得并不真的“无限幸福的”。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作为国统区文学的代表作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

3)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

4) 《在铁链中》,上海海燕出版社,1949年8月版。

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的报告中，就把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意志和生命力解释为对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坚持，是拒绝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⁵⁾这绝对不是茅盾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文艺界的决策层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胡风包括路翎在内的“七月派”作出的不容置疑的定论。随着胡风问题日趋激化，文艺界对路翎的批评也逐步升级。自1951年起，他的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和剧本《祖国在前进》受到严厉的批评，其中贾霁的《剧本〈迎着明天〉歪曲和诬蔑了中国工人阶级》⁶⁾，以及企霞的《一部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⁷⁾上纲最高，仅从题名便可看出批评的力度。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长江日报》上舒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舒芙在谈及《论主观》的错误观点时说：“这种观点表现在文艺创作上，是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的‘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定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必要。”并指出这个错误，其实也是“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共有的，“路翎就是其中的一个。”9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号发表舒芙《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芙在公开信中说：“从去年年底开始，从几种报刊上面，连续看到一些对你（路翎——引者注）的批评……这说明了你在解放以后，还在发展着过去的错误，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我早就期待你公开地表示态度，坦白地承认错误，诚恳地接受真理。直到现在，你还是缄默。我愿意相信你是在深刻的检讨过程当中，希望这封信可以帮助你党的教育之下早日得到应有的结论。”无论是对于报刊的批评还是好友的规劝，路翎的确是始终保持“缄默”。不过，他的“缄默”既不是默默的消沉，也不是无言的抗争，而是一种不屑于辩诬的宽容、坦然与坚韧，是一种奋然前进的姿态的最诚挚的表述。因为他不愿“树敌”，因为他已经认定了他的方向，他要满腔热情地“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要用“新的文艺”的实绩，凸显他对“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的忠诚。

二

5)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

6) 刊1951年《人民戏剧》第三卷八期。

7) 刊《文艺报》第六号，1952年3月出版。

1952年12月，刚过“而立之年”的路翎意气风发地跨过鸭绿江，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讴歌“谁是最可爱的人”，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才回国，与志愿军并肩战斗长达七个月之久。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国作家赴朝，多半是组织安排的，其中确有某些作家迫于“不去也得去”的无奈，显得非常苦恼和惶惑(如巴金，总担心适应不了战地生活，很不愿意赴朝)；而路翎则是主动请缨，满腔热忱。他在1981年3月23日写的《〈初雪〉后记》中说：

我在一九五二年底去朝鲜，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后回国。在朝鲜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访问过志愿军几个部队，到过开城、平壤等地，接触到志愿军的一些指导员，听到了在几次战役中中朝人民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和战斗情谊。也到过许多朝鲜人民家里作客，和他(她)们同桌共餐，欣赏他(她)们的歌唱和舞蹈，听他(她)们倾诉这几年间经历的患难。我也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在壕沟里躲避美帝国主义B26轰炸机……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国际主义精神，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朝鲜人民和军队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都使我感动，并在激动之余写了些东西。除收集在这里的以外，还有同样题材的短篇小说《节日》，尚未发表，现已散佚；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原稿虽已找到，但已不全了。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介绍了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生活和战斗情谊。

短篇集《初雪》收路翎写的志愿军题材小说四篇，即《战士的心》(刊1953年《人民文学》12月号)、《初雪》(刊1954年《人民文学》1月号)、《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刊1954年《解放军文艺》2月号)，以及《洼地上的战役》(刊1954年《人民文学》3月号)。

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给文艺界带来极大的震动，因为当年到过朝鲜的作家中不仅有丁玲、田汉、黄药眠、吴组缙、叶丁易、田间、葛洛、黄谷柳、宋之的、菡子、丁聪这样的知名作家，还有巴金、老舍这样的文学大师。1951年4月16日，“朝鲜文艺界的旗手”——老作家韩雪野在风景秀丽的大同江边会见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文艺界慰问团时说：

“现在朝鲜作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血肉相连的中朝人民的感情表现在作品里，把朝鲜人民的真诚的心情传达给中国人民。”同时他希望中国同志们也这样做。⁸⁾

8) 唐因《朝鲜战场上的中朝文艺——文艺战线上的英勇斗争和伟大友谊》，刊《文艺报》第4卷4期，1951年6月10日出版。

“把血肉相连的中朝人民的感情表现在作品里”，“把中国人民的真诚的心情传达给朝鲜人民”，这是当年“中国作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新中国文学的重大主题，尤其是对于到过朝鲜的作家来说，责无旁贷，刻不容缓，是一项极其光荣而又紧迫的政治任务。杨朔在《与路翎谈创作》⁹⁾一文中说：

凡是到过朝鲜的人，都会感到特别激动，从心里产生一种爱：爱我们的志愿军那种舍己为人的英雄气概，爱朝鲜人民那种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我是个从事创作的人，总想能写出几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这种高贵的精神品质，写不出，便苦恼的很，见了写朝鲜战争的小说立刻就抓起来读，总盼望能从作品里重新见到我们那么爱的志愿军，那么爱的朝鲜人民。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我读了路翎的几篇关于描写朝鲜战争的小说。……

巴金也有类似杨朔的这份“写不出”的“苦恼”。他在《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¹⁰⁾一文中说：

我在志愿军部队中间生活了一年，我接触过不少的人，现在我闭上眼睛还可以说出一些人的面貌，有时候我也感觉到我的心跟他们的心挨得很近，我已经走到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边缘了。但是说老实话，我还是没有明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内心的东西，因此我回国以后一直没有能写出志愿军新人的面貌，而且一直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感到苦恼。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是怀着欢迎的心情来读这篇小说的，尤其因为前一天，一个不相识的年轻读者来找我谈话，向我推荐了它，另一个人也在我面前称赞过这篇“出色的作品”。……我一口气把它读完……

杨朔和巴金有关不知如何描写志愿军“苦恼”和“茫然”，在当时的文艺界是颇有代表性的。新中国的文学“新”在哪里？新中国的文学与“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的“区别”又在哪里？新中国的文学怎样才能成为“划时代”的“新的文艺”，新中国的文学如何凸显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对于每一位忠诚于“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的作家说来，都是一份严肃的试卷。

遗憾的是1930年代“革命文学”中风行一时的“文艺先行”的理论，到了1950年代已经黯然失色，因为革命现实主义被确认为唯一的创作原则，容不得“脱离现实”的浪漫或想象。与之相呼应的是作家的“思想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束缚了老作家的手脚。从而使

9) 刊《文艺报》，1955年第5号，3月15日出版。

10) 刊《人民文学》，1955年8月号。

文艺界面临一个“青黄不接”、十分尴尬的局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敢创作；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知名作家们住进了机关大院，即便分身有术，也因创作源泉的枯竭而搁浅，再写不出华彩的篇章；党一手栽培的年轻作家，虽说根正苗红，但毕竟还很娇嫩，尚不能肩负起“新的文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随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无论是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还是作为“党的喉舌”的媒体，都对1950年代初期的“新文艺”不满。丁玲在《读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与〈冬天和春天〉》¹¹⁾一文中说：

自从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掌握了政权，国家的面貌，其变化之快，进步之快，决非坐在屋子里的人们可以想象的。即使生活在群众之中，也很容易目迷五色，不易把握在遽变之中的最基本的东西。现实虽然在飞跃的变化与进步，但有不少作家却还不曾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很多作品还停留在写二流子转变啦，夫妇吵架啦，一个好干部和一个坏干部啦，一个兵士回家看见有了地有了牛就很满意啦，或者为着怕这些老一套，就添点趣味，添点不确当的恋爱，怎样闹过误会去开展戏剧性，怎样编一个奇怪的故事，大闺女配小女婿的新闻啦……。我们也不能否认以这些题材来写小说，写剧本或其它形式的作品，也有些是写得还好的，可以看得过去，不过比起现实中的人物，现实中的群众英雄和英雄事迹，就显得贫乏，无力，显得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常常听到群众对我们提意见，说作品太少了，说文艺赶不上现实。我想决不是我们写得少，是指我们写得好的太少；不是指我们技术不好，不是指我们故事编得太晚，赶不上，是指我们作品中的人物，思想离现实中的人物的思想太远，指我们作品中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还不是今天的，而只是昨天的。对少数的落后分子，也许还有一点教育意义，但对今天广大群众的教育意义，就觉得不够了。……

“我们作品中的人物，思想离现实中的人物的思想太远”，尤其是“革命干部的形象”最缺乏时代新意。李英华在《严肃地表现革命干部的形象》¹²⁾一文中说：

在某些影片中出现的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差不多都被描写得那么笨手笨脚、憨头憨脑、愚蠢粗鲁、缺乏教养。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恶劣的现象。例如《人民的巨掌》（昆仑出品）和《姊妹妹妹站起来》两部影片就是这样。

11) 《文艺报》第四卷三期，1951年5月25日出版。

12) 《文艺报》第四卷九期，1951年8月25日出版。

《人民的巨掌》把一个公安工作人员(说山东话的)表现得愚蠢粗鲁，一无所知，不时的搔头抓耳，说话仿佛在吵嘴。《姊妹妹妹站起来》里的女工作人员(吴因饰)，也表现为土里土气的蠢样子。

我们的工作干部，在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上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上都是先进的，优美的，思想感情也是明朗，健康的；任何一种对于他们的愚蠢、粗鲁的描写，都是不对的。

可是由于演员、导演缺乏对这些干部的体会，只是凭着主观的片面的认识进行创作，结果我们的干部不是被演成一无所知的笨伯，就是被演成木头人。给人看了，不知道是在歌颂他们呢，还是在讽刺他们？

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偏向。说得严重些，也许是一个思想问题。因为在有些人的脑子里，直到现在还残存着一种对于革命干部的错误观点，正由于这种错误观点没能彻底改变，再加上对干部缺乏体会理解，就只有从另一方面去找出路了，后果则是严重地歪曲了干部形象。

有人看了这些电影后这样说：“怎么搞的！把我们的干部都演成这个样子了！”“这些人，演小市民的人物就那么像，一演我们的干部就糟糕。”这种反映是值得演员和导演们很好来研究的。深入生活，加强这方面的体验，认真、严肃而准确地表现我们干部的形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

从上面援引的丁玲和李英华的文章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新的文艺”正面临一个“更新”和“蜕变”，正面临一个“从无到有”的“探索期”，迫切需要有一批“弄潮儿”充当排头兵，大胆尝试，率先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示范”，以利于更多的作家“学有方向，赶有目标”。路翎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而又充满激情的年代充当了急先锋，他率先发表的志愿军题材小说迎合文艺界的这一需要，于是文艺界把目光凝聚在路翎身上。不排除真的有天真的人们渴望能从路翎小说中看到新中国文学的“范式”，但巴金那番或许代表了大多数作家愧疚和困惑的话语似乎更值得玩味：“一直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感到苦恼。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是怀着欢迎的心情来读这篇小说的，尤其因为前一天，一个不相识的年轻读者来找我谈话，向我推荐了它，另一个人也在我面前称赞过这篇‘出色的作品’”。于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或欣赏，而是一种深入骨髓式的探寻，是在政治和文学双重层面上的最严格的解读。而其结果，也果真应了一句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

三

将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与他在解放前创作的小说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解放后路翎的创作对他的创作道路而言的确是“划时代的”。小说的内容固然不必说，其风格的衍变也前后判若两人。过去作品中的那种“雄强的人性”、“原始强力”、“灵魂的搏斗”、“精神的创伤”、“情感的疯狂”、“心理的纠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爱情，友谊，同情”、美丽而柔和的人性；过去那种狂躁的、激荡的、层层叠叠的、火焰般的热情已经被冶炼成缜密的、清新的、内蕴的恬淡了。路翎文笔素以酣畅深厚见长，如“长江大河，旋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刘西渭语），有时略嫌重浊，而他的志愿军题材小说则多了一些诗情画意，充满了亲情，就是殊死的战斗，流血和牺牲，也写得视死如归，充满乐观主义精神。风度潇洒、才华盖世的路翎大胆突破以往的模式，敢于创新，是脚踏实地的奋斗者。

短篇《初雪》一经面世，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在《读〈初雪〉——读书随笔之一》¹³⁾一文中说：

《初雪》（见《人民文学》今年第一期）这一篇小说，因为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所以也有诗意。它的描写是生动的、细致的和具体的。一个司机刘强和一个助理司机王德贵，奉命从前线附近地区把一批朝鲜老百姓运送到后方去。他们突破了敌人不断地轰炸的封锁，终于安全地完成了任务。这故事是简单和素朴的。作者固然也描写了司机刘强，——他以熟练的技术和高度的机警，对敌机的封锁进行着坚定的斗争。战争的气氛、紧张的夜间行车、苍茫的山野之间闪耀着的车灯和夜的风貌……这些描写，都是生动的、具体的、细致的，也给我们一些“身临其境”的感觉。但作者着力之处，不在于这些描写，而在于司机刘强和司机助手王德贵的精神世界的描写；而在于把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车上的朝鲜妇女、孩子之间结成了一条不可割断的生命线索的描写。……

巴人在文章中又说：“我这拙劣的摘叙，并不能传达《初雪》中所刻划的战斗的生活画面。——尤其是这画面所显示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人物朴茁的靈魂。应该说：《初雪》

13) 刊《文艺报》1954年第2号，1月31日出。

所展示的，是中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生活和战斗经验中生长起来的对朝鲜人民的关怀、热爱与希望。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精神，是生长在劳动人民共同命运、共同生活经验的土壤之上的。只有这一精神，才是鲜血与生命结成的长城，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说一千声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人类”，或者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义与词藻，外加于人物身上，而看不到两个民族人民在战斗中的共同生活的面貌，共同的一致精神，那样的作品也是不能感人的。只有在共同命运与共同生活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战斗的爱和友谊、战斗的希望，那才是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那应该说，就是诗。”巴人认为《初雪》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那应该说，就是诗”。这里所说的“诗”，套用叶圣陶的话说乃是“采集了丰富的材料，出之以严肃的态度，刻意经营地写成的作品”，“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之作，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地雕刻成功的群像”¹⁴⁾。可见，这里所说的“诗”，乃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与被誉为“诗”的《初雪》相比，《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的反响更为热烈，虽说正面的评论遭到打压，未能发表，但我们仍可从当时的大批判文章中撷取一二，借一斑推测全貌。

1、魏巍在《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谈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¹⁵⁾一文中说：

有人洒了同情之泪，深夜写信向路翎致敬。并且还听说一位教授兼作家惊叹它是解放以来最优秀的作品，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作。北京某大学助教甚至认为《洼地上的“战役”》“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某些题材类似的作品比较”，也“不算逊色”。关于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一位读者称誉他是“开放在浓烟烈火中的一丛美丽不屈的红花”，小说中的人物“王应洪是崇高理想的化身，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

2、陈涌《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¹⁶⁾一文中说：

有关爱情这类感情的问题更容易迷惑读者。路翎利用了我们有许多读者还没有清楚的革命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当他在这篇作品用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论的观点来歌颂“爱情”、歌颂“赤诚的眼光”等等的时候，我们有些读者便相信了，感动了，甚至看到王应洪牺牲便认为他是“马特洛索夫”了。这是很大的教训，它说明在我们脑子里建立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说明如果我们分不清反动的唯心主义和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界限是

14) 叶圣陶《其实也是诗——读〈日出〉》，刊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1日。

15) 《解放军文艺》，1955年3月号。

16) 刊《中国青年》，1955年第14期。

很容易走向敌人的圈套，成了敌对的思想的俘虏的。(马特洛索夫，苏联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年仅19岁的英雄，为夺取乔尔努什卡村战斗的胜利，马特洛索夫毅然用胸膛堵住敌人碉堡上的机枪口——引者注)

3、巴金《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¹⁷⁾一文中说：

有一天，“一位不相识的年轻读者来找我谈话”，向我推荐了《洼地上的“战役”》，“另一个人也在我面前称赞过这篇‘出色的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是描写志愿军侦查员的生活和斗争的小说。路翎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那个黑帮头子胡风说：‘这一篇……引进了广大读者的感动。由老作家到部队的战士和干部被这里面的人物感动了。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一股热潮。’作家们有的说从路翎的小说才看到了真正的志愿军。’他还转述一个作家的话：‘路翎所写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的人们思想心理有多少的真知灼见，’路翎把战士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宽阔而美丽的胸怀，朴实而忠诚的性格表现得多么深入多逼真。”

小说的主题，是围绕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少女金圣姬的不能实现的爱情来展开的。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王应洪应该有他的恋爱，但作为一个战场上的战士只有握紧手中的枪，作者真实地刻画了志愿军战士内心的矛盾和斗争，非常深刻地表现了，战士的恋爱违背了军队的纪律，但爱情毕竟是伟大的，战士懂得爱。也正因为王应洪懂得爱，才会在“战役”中为着同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显现了崇高的性格和伟大的精神。可是，当时的文艺界和主流意识形态不允许写志愿军的“恋爱”。诚如巴金所说的，当他“一口气把”路翎的小说读完之后，就发现了许多与“时代主潮”、与党对“新的文艺”的要求相背离的东西，于是中共主管文艺界的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动员报告，号召文艺界对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予以“严正”的批评。周扬报告的题目为《我们必须战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¹⁸⁾，“我们必须战斗”，这掷地有声的六个字显现出当时的气氛是多么严峻！在周扬的号召下，大批判风起云涌，路翎陷入四面楚歌。且看大批判中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1、常琳《对〈洼地上的“战役”〉的几点意见》¹⁹⁾一文中说：

17) 刊《人民文学》，1955年8月。

18) 《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合刊，12月30日出版。

19) 刊《文艺报》，1955年1-2号合刊，1月30出版。

作者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政治工作者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软弱无能的人。……团政委是一个团的政治领导者，是党的代表，他教育战士，提高部队的警惕性，是要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战士，以形势和任务教导他们，使他们自觉的提高警惕性。这才是正确的训练战士的方法，也才能保证我们部队永远向着胜利。（指责路翎不该在小说的开头描写团政委同侦察员试探岗哨的“警惕性”——引者注）

连政治指导员……帮助姑娘（金圣姬）推磨子，逗姑娘笑，而且一看到金圣姬笑就高兴，……这是多么不恰当！作者尽量的把党的政治工作者写得这么滑稽，轻佻漂浮。这又一次的证明了他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对待事物。我们党的政治工作者，是有他独特的政治态度，高贵的品质和正确的行动的，而作者并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2、谭军《从路翎的作品看胡风的所谓“思想改造”》²⁰⁾一文中说：

看了路翎的描写部队生活的小说之后，一个极其突出的印象是：路翎笔下的中国人民军队的军官与士兵都是一群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思想低下、感情灰暗的个人主义者。平时也好，战时也好，甚至在与敌人进行残酷的生死搏斗的紧张关头也好，他们的脑子里想的尽是个人的利益与个人问题。家庭、爱人、孩子、爱情……成为人民军队官兵内心世界里几乎是唯一的、最本质的东西，这些个人的东西，成为军官与士兵们产生英雄行为的唯一的动力。

3、《解放军文艺》记者《路翎写我军的目的在于瓦解我军的斗志》²¹⁾一文中说：

大家知道他所写的《洼地上的“战役”》，就是直接向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开火的，而且，这个作品也确实在某些读者中起到过它的动摇斗志的破坏作用。

4、康濯《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²²⁾一文中说：

路翎用他的灵魂刽子手的笔，把我们伟大的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横暴地涂改成令人不能容忍地渺小的个人主义与低下和卑微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基础，不是怀念家乡和亲人，就是幻想老婆烧烧火，丈夫扫扫院子的所谓和平生活；也即是胡风分子们的所谓人类靠它繁衍的那一点卑微的感情，或者是陈立夫的“唯生论”所宣扬的那一点人生的根据。路翎就是这样巧妙而恶毒地全部推翻了伟大的中朝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的基础，全部推翻了伟大的中朝人民对于英雄主义的战斗劳动的自觉和对于保

20) 刊《南方日报》，1955年3月14日。

21) 刊《解放军文艺》，1955年7月

22) 刊《文艺报》，1955年12号，6月30出版。

卫和平与创造幸福生活的远大的向往与追求，全部推翻了我们人民志愿军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和性格，并以胡风们的那一点卑微的感情狂妄地代替了上述的一切。这种偷天换日的代替，不仅没有任何的共产主义的思想的影子，不仅永也无法通达到共产主义，而且是与共产主义针锋相对，甚至是与任何一个普通的中朝人民或普通的个体农民的思想觉悟针锋相对的。当反动的作者怀着他们强烈的感情，让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论在火热的战斗中或是在日常生活里，日夜低回着家乡小河边摸鱼的生活和邻家姑娘的调皮大笑的时候，作者是多么专横地硬把他的人物和读者拉向虚无缥缈的世纪，拉向“世外桃源”！如果说，在我国历史上封建阶级混战的年代，陶渊明写出了某些人的世外桃源的幻想，那是自然的合理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的朝鲜战场，路翎却要把中朝的战士和人民拉向世外桃源，这难道不是在存心布置渺茫的阴暗的天地，以便瓦解我们的部队，瓦解中朝人民的斗志，去为华尔街老板帮忙么？

作为文学大师巴金到过朝鲜战场，“在志愿军部队中间生活了一年”，并“曾在路翎到过的那个军、那个师里生活过一个时期”，他以一个了解志愿军、熟悉志愿军，已经走到志愿军“精神世界的边缘了”的权威的发言人的身份来讨伐路翎，文章题为《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可谓一言九鼎。文中说：志愿军心里只有“祖国”，“但却没那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小说中的新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是“桃色事件”。“路翎笔下的王应洪的性格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崇高，‘宽阔’，‘朴实’，‘忠诚’，而是相反，他有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所赞美的‘崇高’和‘忠诚’。因此他不得不用‘英勇牺牲’来维护王应洪的‘荣誉’了。”“王应洪的‘自我牺牲’也是假造的”。“魏巍同志把《洼地上的“战役”》看作‘一本对革命纪律有血有泪的控诉书’是完全对的。”文章在谈及最后班长王顺把王应洪的遗物交给金圣姬，还希望金圣姬永远地记着这“爱情”时说：

这里没有一点真实，这里充满了恶毒的谎话。路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很简单：他敌视和痛恨那些真实的东西，敌视和痛恨人民军队和正义的战争。他要作反革命宣传，因此他就要按照自己的反动思想立场来“改造”现实生活里的人物，把他自己的反动思想装在每一个人物的身上，让那些人说作者心里的话，遵照作者的指示而行动。用卑鄙的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用腐朽的自由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用颠倒黑白的办法来达到其反革命宣传的目的。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被揭露以后，作为这个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一的路翎的

作品，是为什么人服务，是反对什么人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类似的大批判文章还有很多，总之，对《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是急风暴雨式的轮番轰炸，重复得最多的是路翎以《洼地上的“战役”》为代表的志愿军题材小说内容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形象是“伪造的”、“歪曲的”；是对人民军队的“诽谤”；是对志愿军军心的“瓦解”；小说本身就是“阴谋”，居心极其“恶毒”，铺天盖地的批判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使路翎如坠五里雾中。他写了长达四万字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²³⁾申诉、辩解，但这真诚的申诉和辩解又成了反党反革命的新的罪状，当年的文艺界必欲置路翎于死地而后快。

四

《洼地上的“战役”》是十恶不赦的大毒草，还是一篇比较真实的小说？纵观1950年代的大批判文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确有“真实”的一面。就连到过朝鲜战场、以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享誉一时、批路翎批得较为猛烈的魏巍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谈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²⁴⁾一文中说：

路翎描写朝鲜战争的某些小说，首先给人的印象，就是它的不真实。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采集朝鲜战场上的一些事件、一些生活和一些人物，也不是说他没有运用这些事件、这些生活和这些人物。然而，由于他那种不肯改变的耍傀儡戏的创作方法，这些事件、这些生活和这些人物，不过是给他的傀儡戏添置了更鲜艳的服装，变更了更时髦的脸谱。

《解放军文艺》记者写的《路翎写我军的目的在于瓦解我军的斗志》²⁵⁾一文中说：“志愿军里有一位同志和一位朝鲜姑娘，由于工作关系相处在一起，并曾处在互相爱慕的萌芽状态之中，由于这个状态的发展在目前是军队纪律和中朝两国人民长远利益所不容

23) 刊《文艺报》，1955年第1、2号合刊(1月30日出版)，及第3号(2月15日出版)和第(2月28日出版)。

24) 刊《解放军文艺》，1955年3月号。

25) 刊《解放军文艺》，1955年7月号。

许的，这个同志在组织和群众的正确的教育之下检讨了自己的行为”。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即此可见《洼地上的“战役”》并非是出自“反动”的“伪造”，而是有生活作基础的。虽说“生活的真实”不同于“艺术的真实”，但绝对不可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出自“反动”目的的“蓄意编造”。至于《洼地上的“战役”》是不是“解放以来最优秀的作品”，够不够“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作”；能不能“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某些题材类似的作品比较”；王应洪是不是“崇高理想的化身”、“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固然可以讨论。但纵观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的确是有特色的。这特色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小说所描写的并不是战争的大场面，而只是如火如荼的战斗中的小插曲；二、不是凸显战争激烈和残酷，而是侧重于运用细致的笔墨描写战士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把战争作为人物的背景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契机；三、不是描写所谓的气吞河山的“英雄”，而是关注普通的士兵；四、不是写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而是写战争孕育了美好的人性，战争净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五、没有豪言壮语和生硬的说教，以日常生活和情感见长；侧重写官兵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理解。总的说来，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突出的是一种精神：即人与人之间的爱，这种由鲜血与生命凝结的爱，才是一种克敌致胜、不可征服的力量。这是路翎对于现代战争的独到的见解。路翎不像有的作家那样用战争来激发憎恨，而是在战争中讴歌人性；淡化战争小说的“火药味”，纯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出战争中的“人”，以及“人的单纯、真挚而美好的情感”，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那么的亲近而崇高。志愿军内部官兵之间生死与共，中朝两国人民之间情同一家。作家在塑造志愿军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地去渲染国际主义精神，而是抒写中朝两国人民深受外来侵略的共同经历，以及由这种“共同经历”孕育的兄弟般的情谊。志愿军战士热爱家乡，因而也热爱朝鲜人民的家乡；志愿军战士爱父老乡亲，因而也爱朝鲜的父老乡亲；志愿军战士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因而也爱朝鲜的妇女和儿童。从而把志愿军战士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宽阔美好的胸怀，朴实而忠诚的性格表现得深入，逼真。

路翎志愿军题材小说“作为一种历史笔录，是客观存在”²⁶⁾。对于我们解读那一场战争、认识1950年代的中国有启示性的意义。路翎的遭遇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新文艺的“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和人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而路翎恢复自由后

26) 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敬》，刊《读书》1981年第2期。

思想却被“左”的框框牢牢套死，只能写“极左”作

品的事实，天才的沉落，发人深省。而这沉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坛上的斯德哥摩现象

在瑞典的斯德哥摩，曾经有过被绑架者与绑架者发生恋情的事情。由于被绑架者与绑架者独处，被绑架者认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绑架者给的，于是对绑架者产生特殊的感情，以至深深地爱上了绑架者。中国的作家和老革命中也有这种“斯德哥摩现象”，他们深受“极左”路线的打压，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摧残，九死一生，可他们“平反复出”后对毛泽东更忠诚，思想更僵化和“左”倾。中国的“右派”晚年大都成了左派；中国的“左派”晚年大都成了右派。这个变化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就拿路翎来说吧，他最后10年(1985至1994年)，写了500万字，“小说的确没有任何阴暗面，写的都是颂歌，革命味道也相当浓厚”；“在这里，路翎过去曾经苦苦追求的‘真实’没有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的品格也没有了。他习惯了不说‘不好’的话，即使是自己身受的‘苦’。”²⁷⁾然而，一味地为歌颂而歌颂，一味地为说好而说好，也就背离了文艺的宗旨，失去了文艺的价值。

27) 朱珺青《路翎传》，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第86号。

参考书目

《文艺报》，1949至1957年。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

张环、魏麟、李远志、杨义编，《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朱珩青，《路翎传》，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Abstract

Feel miserable by loyalty and courage - Review on the novels on the
subject of Volunteer Army of Lu Ling

Shang Jin-li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ruggling course of Lu Ling who was regarded as a genius writer in china. By analysis in that specific times and history context of his <The First Snow > and <Battle On The Low-lying Ground>, which are Lu Ling's representative novels on the subject of Volunteer Army,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writer's life destiny, and presents the actualities of literature circle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 Lu Ling, <The First Snow > , <Battle On The Low-lying Ground>, novels on the subject of Volunteer Army